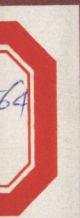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天津大学(北洋大学)百年办学回顾

世纪记往

A Century of Memories



天津大学（北洋大学）百年办学回顾

A Century of Memories

0171451



世纪记往

主编：杨慧兰 副主编：左庆生

天津大学出版社

世纪记往

A Century of Memorie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世纪记往 / 杨慧兰编, —天津: 天津大学出版社,
2000.8

ISBN 7-5618-1343-0

I. 世... II. 杨... III. 天津大学—史料
IV. G649.28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8567 号



天津大学 (北洋大学) 百年办学回顾

世纪记往

责任编辑: 张金铨

书籍装帧: 李春来 苏洪源

出版: 天津大学出版社

出版人: 杨风和

地址: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 (邮编: 300072)

电话: 发行部: 022-27403647 邮购部: 022-27402742

设计: 百川时空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: 深圳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
发行: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2

印张: 12

字数: 350 千

版次: 200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8 月第 1 次

印数 1-2000

定价: 40.00 元



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

天津大学（北洋大学）百年办学回顾丛书

编辑委员会名单

主 任：杨渝钦 单 平

委 员：杨渝钦 单 平 王玉林 高文新 郁道银

寇纪淞 张宏伟 胡小唐 苏全忠

总 主 编：王玉林

副总主编：王 杰

编 辑：王 杰 杨科琳 韩云芳 杨慧兰 左庆生

孙晓军 胡如光 赵晓梅

图片编辑：王建泽

摄 影：王建泽 吕大力 陈庆丰 王永生等

英文翻译：张凤林

责任编辑：杨风和 高希庚 李继信 张金镠

总体设计：李春来

设计制作：李春来 苏洪源 刘新英

CONTENTS
目录

巍巍学府北洋高

悼张太雷同志	(瞿秋白)	4-2
回忆我在北洋大学	(茅以升)	4-3
北洋大学回忆片断	(张含英)	4-5
“五四”今犹记 “九一”故地游	(孙越崎)	4-8
忆母校第一次复校	(刘景山)	4-10
北洋忆往	(魏传基)	4-11
北洋大学回忆片断	(魏寿昆)	4-12
忆北洋发扬好传统	(常锡厚)	4-14
母校北洋六年的大学生活	(朱玉仑)	4-16
北洋连中三元	(叶秀峰)	4-19
我在北洋	(邓曰谟)	4-20
抗日战争初期的北洋工学院回忆片断	(马恩春)	4-21
回忆抗战时期的北洋西北工学院片断	(潘承孝)	4-22
抗战前期与胜利后之北洋	(李书田)	4-24
国立北洋大学复员经过	(张务滋)	4-25
北洋大学地质学系的历史情况	(李汉瑜)	4-26
北洋大学之过去五十三年	(李书田)	4-30
“八、二〇”事件后北洋大学的地下党	(杨启绍 聂璧初)	4-34
解放初期的北洋大学	(笑 始)	4-37
北洋今胜昔二十韵	(茅以升)	4-40
北洋大学校史简忆	(杨玉珍 常锡厚)	4-41

求实创新绘宏图

领袖的关怀	(吴建秀 杨风和 韩宝志)	4-44
——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江泽民视察天津大学		
纪念天津大学(北洋大学)建校八十五周年	(李曙森)	4-47
建校九十周年的回顾与展望	(史绍熙)	4-50
明确目标 在改革中发展	(吴咏诗)	4-53
——天津大学“七五”期间发展回顾		
在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	(李光泉)	4-57
承北洋教育优良传统 创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	(郁道银)	4-61
——本科教学建设回顾		

CONTENTS

目录

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	(胡小唐)	4-66
植根百年沃土 造就跨世纪英才	(张宏伟)	4-69
——记天津大学学生素质教育工作		
天津大学校园建设礼赞	(高文新)	4-73
办学之道 教师为本	(王玉林)	4-76
天津大学科技跻身“国家强队”行列	(李 丹)	4-80
精心建设跨世纪战略工程	(吴建秀)	4-83
——天津大学“211工程”建设巡礼		
高科技托起“天大天财公司”	(李 丹)	4-87
“双酚A”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的拼搏史	(吴建秀)	4-90
在开拓中不断发展创新的填料塔新技术	(赵汝文 李 丹)	4-93
世纪沧桑话外事	(刘德符 张向阳)	4-96
——天津大学百年国际交往与合作		
继承 创新 求实 发展	(王 杰 杨风和)	4-100
——天津大学(北洋大学)百年校庆记实		

继往开来掌校人

盛宣怀的办学思想与实践	(王杰 宋彧)	4-104
丁家立掌校北洋11年	(笑 始)	4-107
矢志教育和严谨治校的王劭廉	(王 杰)	4-108
爱国教育家赵天麟	(张绍祖)	4-109
毕生读书教书写书的刘仙洲	(黎诣远)	4-113
桥梁专家和教育家茅以升	(王杰 宋彧)	4-118
李书田耕砚公传略	(常锡厚)	4-122
著名治黄专家和教育家张含英	(散 穆)	4-126
湍流理论家和教育家张国藩	(徐 玮)	4-128
毕生献给祖国教育事业的刘锡瑛	(王家琦)	4-131
把天津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倡导者李曙森	(刘应宗)	4-134
编后语		4-1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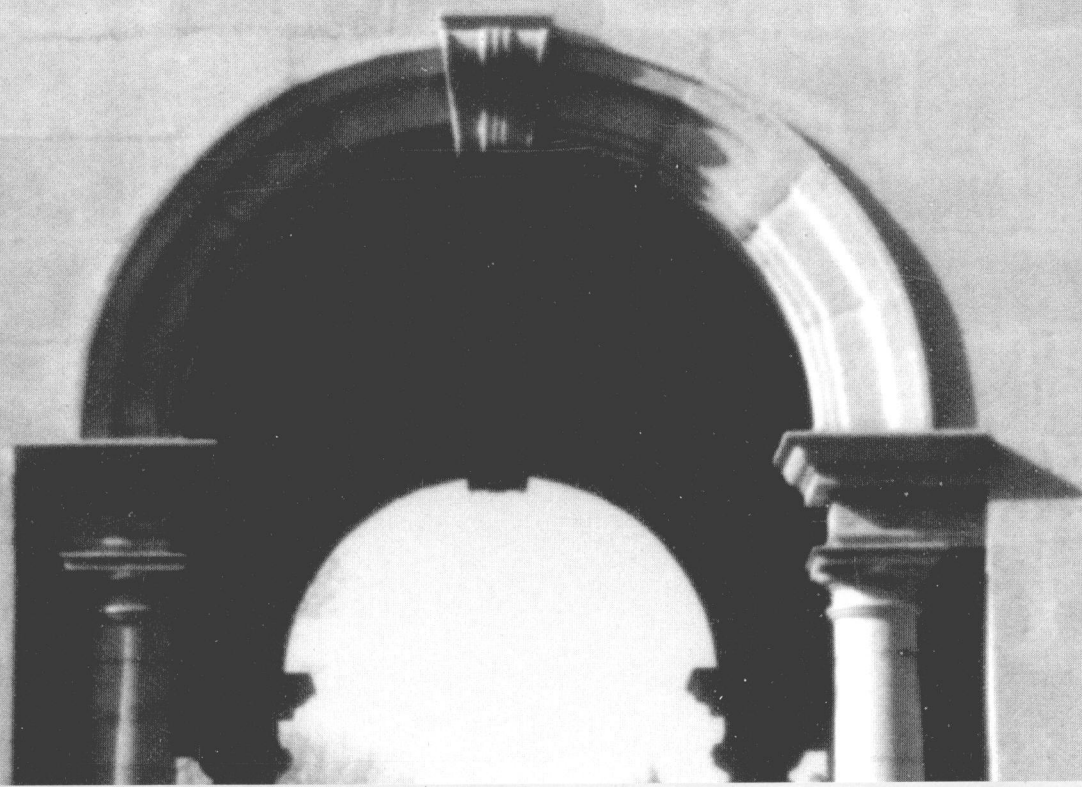
魏

魏學府北洋高



北洋大學堂

1895



悼张太雷同志

瞿秋白

张太雷同志死于广州暴动时反革命军阀的乱枪之下了！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代理平民行政委员会主席张太雷同志，被反革命军阀的惨杀而死了！广州12月10日晚上的暴动，负主要的指挥责任的是张太雷同志。当天晚上革命的士兵进攻反革命的公安局，革命的工人群众武装暴动起来解除广州反革命的炮兵营的武装，占领反革命政府的机关，11日天明的时候，差不多全广州市已经完全为工人赤卫队所占领，反革命军队大半解除武装；成批的兵士群众到工人赤卫队来投效。于是当天就开革命群众的代表大会，选举苏维埃政府。张太雷同志在暴动之前三四天，每天晚上亲自到革命兵士的秘密会议，去做报告，去组织他们。暴动胜利之后，他便由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的指定，提出于广州工农兵代表会，一致通过而被委任为军事平民委员长；又因选任的平民行政委员会主席苏兆征同志，尚在海丰未能赶到，由他暂代。他受共产党的指挥而组织广州的暴动，能够绝对服从党的命令，极其艰苦的工作。暴动的前后，他尤其是非常的劳瘁。11日他便听广州苏维埃政府命令，组织工农革命军和广州市赤卫队，极广大的群众都来参加。工农革命军和革命的群众猛力攻击长堤一带的反革命机关，并且极力要打过珠江到河南方面去消灭反革命的李福林的势力。但是，因为帝国主义军舰及反革命的国民党军舰的阻挡，这历次的攻击始终没有成功。12日晨，因为开广州市的群众大会，张太雷同志出席报告。这时候，李福林的军队已经由帝国主义军舰掩护，在僻远处渡珠江，绕道广州北部来攻击。广州市内的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大半都开到北部去应战，所以敌人又能乘虚攻袭公安局——暴动后之总指挥机关。等到张太雷同志从群众大会回到总指挥机关的时候，这机关已被敌人占领，敌人便用乱枪向他的车子射击。结果，太雷同志身中三枪，最后一枪中在心窝，胸膛炸裂而死了（12月12日下午2时）！虽然当时群众和赤卫队又重新将公安局夺回，但是12日那天晚上，反革命军队已经战胜，革命的工农军不得不退出广州，到花县一带去。而张太雷同志瞑目的时候，广州暴动还没有完全失败呢。

张太雷生于1898年。他的家乡在江苏常州，他父亲是一个小商人，很早便死了。他那时还没有10岁。他的母亲一直是借债度日。他在这种困

苦的家庭中，勉强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毕业。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时候，各种社会主义的团体风起云涌地起来。张太雷就参加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以及后来共产党成立时之最初组织。他加入党之后，便抛弃一切而为党工作。他曾经派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之第三次大会。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时，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，同时，被任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。1925年春调往广州，与陈延年同志共同工作，担任人民周刊的编辑，同时帮助鲍罗廷同志。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（1927年5月）时，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，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。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，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紧急会议，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并且派到广东，担任广东省委员会的书记。他在党里历次担任负责的工作，他的坚决与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。如今他是死了！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：李大钊、陈延年、赵世炎、王荷波……如今张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牺牲了。

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，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。他死时，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；他死时，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，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！

（原载《回忆张太雷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）



回忆我在北洋大学

茅以升

北洋大学在全国大学中是建校最早的，因而素有“老北洋”之称。当然，所谓老，不一定是美誉。老干部、老科学家是尊称；老官僚、老学究就是贬词了。但北洋属于前者，历史虽老，教学不旧，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，绝大部分能顺应潮流，时有建树。特别在政治上，学生运动也是勇往无前的。北洋校内的几次罢课学潮是可歌可泣的；全国性的学生运动，北洋学生也素不后人。1949年天津解放后，校友中的地下党员及先进分子回校探望时，人数之多，说明北洋对中国革命的贡献。

这里，谈谈我与北洋大学的历史渊源。

1926年夏，我在北京，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先生来访，约我去授课，因为结构学教授美国人阿罗克（O' Rouke）合同期满回国，经李书田先生推荐，要我去接他的手。我于1920年自美回国后，曾在唐山交大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，后在南京东南大学担任过教授兼工科主任，对于教书向来有兴趣。刘校长约，正中下怀。但那时我在北京有任务，一时走不开，就商定先去兼课，度过缺人难关，每星期去天津一次，到了1927年夏，才接受北洋大学专任教授职。那年去天津时，就住在老友罗英先生家。1916年，他和我以及郑华先生同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桥梁系研究生，那时该系除了我们三个中国人以外，并无美国研究生。我每星期去津时，与罗先生晤谈，颇得教益，后来我就约他往钱塘江桥共事。

我在北洋大学任专任教授时，主讲结构工程及有关各科，每星期授课二十几小时。我将每星期课程，安排在四天内，每天上午授课，腾出三天时间（包括星期日）搞科学研究，这就给了我时间来研究如何改进教授法。在这以前，我在唐山及东大授课时，曾创立了几种教授法，其目的在启发学生思考，引导学生深入钻研，如学生提一问题而我不能答复，就给学生满分。这个方法获得成功。我带到北洋，同样受到欢迎，因而听我课的，除了本届学生，还有些上届学生已经学了一遍再来补习的。

1928年夏，天津陷入战区，北洋大学停课，我回到南京老家。十月间有北洋学生专程来南京访问，劝我回北洋大学任校长，我婉却之。十二月初，北平大学区成立，将北洋改称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，校长李石曾来电，约我为院长，学生亦来电表示拥护，我不得已北上。到北平后，学

生代表一再敦劝，云我不去则复课无期。天津北洋校友会张务滋、徐绍裕先生等专程来京恳劝，备言学校停课已久，极盼我去收拾局面。我辞不获已，向李石曾声明，前往暂就，仍请另觅继任。于是我于12月26日在天津就北洋院长职。除聘谭真先生为秘书外，其余教职员，除辞职者一概未动。

我何以不愿当院长呢？因为在北洋军阀专政时期，全国混乱，即学校亦动荡不安。我在唐山及东大，饱受派系倾轧之苦，视行政职务为畏途，故就北洋院长职时，即存“五日京兆”之心。

我就职后，目击院内停课多时，百废待举，即动员各方力量，逐步恢复旧观。北洋不但历史久，而且教育新，所聘的教授皆国内外知名之士。历年来教诲不倦，辛勤培植，故功课严格，力争上游，在国内与唐山交大、上海交大齐名。教授中不论本国人或美国人，教务均甚繁重，每星期授课二十小时以上，故人数较少。教本采用英文原版，内容完备而有系统，同时亦给学生外语训练。校风淳正，学生大部分都能刻苦勤学，但亦不忘政治。我通过考察，竭力维持各种优良传统，并欢迎学生提意见，能办者即办。天津北洋校友会，关心院务，常有校友来院访问，特别是张务滋、徐绍裕、齐璧亭先生等指教尤多，深得其惠。

1929年3月31日晚，院内一座主要建筑教学大楼突然起火，因距市区甚远施救不及，竟致全部被毁。北平大学校部派谢树英先生来院协同调查起火原因，终未查明。

各地北洋校友会，闻火灾消息，莫不震动，纷纷来信慰问，都表示愿为恢复大楼尽力。

我当即收起辞职之念，决心尽我全力，筹募工款，以恢复校舍、重建一更好大楼为己任。不久，南京大学院取消，恢复教育部，本校亦改称“北洋工学院”。这年夏，我往南京教育部接洽筹款，时部长为蒋梦麟，对北洋颇表好感，因校友王宠惠、王正延等均其旧交，因授意此项恢复经费，可在“中比庚款”（比利时国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）中设法解决，因此项“庚款”尚不为多数人所注意。这时黎照寰先生为铁道部次长兼上海交大校长，曾一再向我表示，希望我去交大，任土木系工程院长，适巧他是“中

比庚款”董事会的董事，我因往沪求教，他一口应承，表示负责办到，并笑说：“我给你十万元，你给我一个院长！”于是我向“中比庚款”董事会正式提出，请拨十万元，恢复校舍。其时该会负责人为褚民谊（后来当了汉奸），我找他多次，他都表示冷淡，但我盯着他不放，并同董事会其他董事分头接洽。他们散居南京、上海两地，我分头往访，沪宁奔驰，有一段时期每晚都在沪宁火车的卧铺上过夜。最后，果然该董事会通过，补助北洋十万元，恢复校舍。其时又有天津电车公司（比国投资）捐款一万元，估计恢复原来大楼而有余。于是一面交比国一设计公司设计（此系“中比庚款”董事会中比国人的要求），一面请几位北洋校友组成保管委员会保管此项建筑专款，免被挪用。保管委员会主任为赵天麟先生。

由于请款成功，校内对我信任益坚，我辞职的话提不出来了，于是安心整顿校务。北洋为国内最老的新式学校，因而也有一些旧的传统习惯需要打破。最妨碍教育进步的为“贷书制”，即将教科书借给学生，于毕业时交还。其时由于学校经费日紧，无力每年购换新书，教本日益陈旧。我在南京时，遇到一位方鸣皋先生，他能将原版书不经照相来翻印，成本甚低，我就请他来北洋，主持翻印教科书事，印出的当作讲义，无偿发给学生。于是全校所用的教科书，每年可以全部更新，师生都很满意。

我在沪宁接洽“中比庚款”时，趁便延揽新教授，果然请得科学界老前辈胡敦复先生主讲物理学，卢恩绪先生担任土木工程学。胡先生是清华学校（后来发展为清华大学）创办人之一，在我国科学界负有重望。卢先生是辞谢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职不就来北洋的（后来仍去清华任院长）。得到两位名师，院内师生兴高采烈。

在南方时，杭州北洋校友约我去报告院务。他们本来准备发起募款运动，为母校造大楼，因知“中比庚款”成功而作罢。

1930年春，院内忽起风波。多年来，院内教授常有每星期往北京各大学兼课的，愈演愈烈，以至有的教授需在星期日上课，招致学生不满。于是我和这几位教授进行谈判，请他们或在北洋或往北京，不能兼任。他们就一面辞职，一面鼓动学生，说我排斥好教授。受鼓动的学生中有几位认为我当院长是由于他们的“拥戴”，而我一年来并不大听他们的话，他们就想“换马”，于是鼓动风潮，使我难堪。我本来无意于行政工作，于是一再向教育部辞职，并去南京面陈内情，终于得到同意，另派蔡远泽先生继任。

1932年，李书田先生继蔡先生为院长，约我回北洋任教授，先是兼职，后为专职。我仍担任结构工程课，对教授法又有所改进。

1933年3月间，我接杭州友人来信，约往杭州谈钱塘江桥事。8月间辞北洋教职，在杭州就任桥工处长职。

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开年会，举行三十周年纪念会，北洋

校友到会的很多，开过一次全天的会，商议复校问题。因北洋在日寇侵入天津以前，迁往西北，并入了西北工学院。李书田先生和我商量，在贵州复校。我那时在贵州平越县（今福泉县）任交大唐院院长，曾和李去附近的一块地方看校址，可惜未有结果。

1946年初，因抗日战争胜利，迁往内地的各大学均迁回原址，北洋大学亦迁回天津复校。经过北洋校友的努力，教育部于这年六月发表“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”委员名单，约我为委员兼秘书，不久即由委员会推荐，由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，但我因钱塘江桥在抗战伊始为我方自动炸断，这时我正在杭州负责修复，一时不能到职，由教育部发表教务长金问洙先生为代理校长。

1947年9月，我从南京飞到北平转天津，往北洋探望诸旧友，对他们抗战中迁徙流离之苦，表示慰劳。同时，为了安定校内情绪，想在了解校内情况后，向教育部建议善后办法。我向校内各负责同仁，特别是金问洙、李书田、陈苾民诸位先生，陈述我不能就任校长的原因，得到他们的谅解；同时拜访天津校友会各位，答复他们一年来屡次劝告我就职的盛意。我回南京后，即向教育部报告此行经过，再次陈请辞校长职，最后得部同意，改派张含英先生继任北洋大学校长。

在回忆当年我和北洋大学的历次关系后，感到非常愧对学校，虽承校内师生对我如此信任，而我为外务所牵，总未能始终其事。假如我从1927年起即专心一致，担任校事，锲而不舍，劳怨不辞，直至1949年解放，学校总可减少些动荡，不无裨益。所堪庆幸的是，在这些年内，全校师生团结一致，奋发图强，维持了老北洋的声誉于不坠。在每每祝贺北洋大学的校庆时，人人可以自慰：“我们始终贯彻执行了‘实事求是’的校训！”

附带谈一件事：在1930年左右，北洋教授美国人爱利斯（Ehlers）先生发起组织“斐铎斐”荣誉兄弟会（Eraternity），凡各知名大学毕业生中名列前三名至五名的，得申请为会员。经该地驻在北洋的理事会批准为会员的，可以佩戴金质会章，上镌Φ T Φ三个希腊字母，作为荣誉的表示。在抗日战争前，每年都有各著名大学的新会员。自北洋在抗战中西迁后，此兄弟会理事会即无形消失，我自己也把它忘记了。不意1979年我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赴美国作友好访问时，方才知这个斐铎斐兄弟会的会员，一直在美国进行活动，每年改选会长，当选者以为荣，印在名片上。他们得悉北洋并入了天津大学，斐铎斐兄弟会理事会亦不存在，都为之叹惜不已。（本文写于1980年）



北洋大学回忆片断

张含英

我在北洋大学读书的时间不长,但对它却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回忆六十年前的往事,恍如昨日。北洋大学是正式的名称,天津市民习惯叫它“西沽大学堂”。西沽桃花堤,风景宜人,是天津八景之一。沿着曲折的北运河堤岸,春日的桃红柳绿,吸引了多少游人。校门巍峨的钟楼和那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,每次看到都使我停足注目不已。

走进校门,路两旁高耸成行的白杨树,哗哗作响,使人心情愉悦;悠扬的钟声引导着我们的学习和工作。这种优美、恬静的学习环境,我在国外也很少见过。在这里,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。

一个志愿考进北洋

我是山东菏泽人。菏泽是曹州府首县,位于黄河南岸不远的地方。菏泽城外有护城堤,这是因黄河经常决口泛滥而筑的。老人们说,曹州是历来黄河经常泛流的地区,近年不还时常听到黄水涨发的警报吗?清朝咸丰年间改道的大灾难,是他们亲身经历的。我每每站在堤顶向远处望,默想着,思考着,这条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,怎么又会带来这样大的灾难呢?能不能治理呢?这种原始的、模糊的念头不断在头脑中酝酿着。中学快毕业了,学什么呢?我决定走建设祖国、改造自然的道路。

家乡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人,我向他们述说了我的想法,并问他应该考哪个系?它说:“土木。”我又问:“在全国大学中,哪个大学最好?”回答是迅速和准确的:“最好的是天津的北洋大学!”后来我又问了好几个人,大家竟一致推荐去北洋。我暗暗下了决心,好!我一定考北洋。就这样,在我中学毕业后,第一个志愿就是考北洋大学,根本没有第二志愿。那时北洋在天津招生,同时也在北京招生,为了达到一定要上北洋念书的目的,我不但在北京报了名,也在天津报了名。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!当时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。

虽然我在中学时学过三四年英文,成绩不错,但进入北洋后,仍然感到困难。这个学校要求很严格,教员很多是外国人,英文、德文、物理、化学等课程全用外语讲授,听起课来很吃力。两门功课不及格就降班,制

度掌握得非常严格,毫不通融。所以同学的脑子中,总是考虑着降班这件事。可以说,“严格”是北洋的一个特点。

教师中有些“有名气”的人兼课。一般说,教学水平也不一定很高。北洋的毕业生所以能有点真才实学,恐怕和这种严格要求是有关联的。北洋的同学平时很少到校外去活动,顶多偶尔到东北城角大胡同等处转转,大部分同学也就是晚饭后到路旁的桃花堤上走走,一听到钟声(七点钟),便急急忙忙赶快回去,不敢稍加停留。在北洋上学,头一年降班的相当多。正因为要求严格,所以基本学科的基础打得比较牢固,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。

北洋当时与别的学校不同,它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。由于教员很多是美国人,所以不是间接影响,而是直接影响,把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套搬了过来,不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是美国教材,课外还介绍了不少欧美科技发展情况,使学生思想开阔,扩展了知识面。

“五四”运动后全体学生被开除

我是1918年考入北洋的。听说根据蔡元培的意见,将北洋的法科转入北京大学,同时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。1918年北大最后一批工科学生转入北洋。北大从那时起就没有工科了。

1919年伟大的“五四”运动起来了。广大同学卷入了爱国的热潮中。天津学生受到北京的感染,基于爱国热情,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。这和当年在天津读书的周总理、邓大姐有密切关系。我个人觉得,天津掀起这样大规模的运动,不是偶然的。拿我来说,我本来是个只知死读书的人,一心只想学点本事,建设国家,算不上个革命青年。可是当运动一起来,我却被时代的浪潮卷了进去,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,参加了游行和其他活动。

我记得很清楚,那时白天出去游行,晚上在化学教室——那是个梯级教室开会。我当时不是活跃分子,只是个一般的参加者,总是坐在后排。在开会时,我时常看到有两个男青年走进来,坐在最前排靠门口的座位

上,没等开完会,就先走了。我曾问过那两个人是谁?同学告诉我“南开”的。这印象非常深刻。我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北洋自发的,而是有组织的。

1919年的暑假后,运动还在继续。赵天麟校长辞职,由冯熙运继任。这时学校挂牌,将学生全体开除,如有愿意回校继续读书者,要递“悔过书”。我虽然很愿意读书,对北洋大学的感情又很深很浓,但“五四”运动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,是正义的行动,学校当局对之却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,十分气忿,参加运动没有“过”,为什么要递“悔过书”?我毫不犹豫地吐出了一个字:“走!”下一个问题,便是转向何方。虽然想到“五四”策源地——北京去,但还有待联系。适在这时,北大的中学同学传来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:北大当局表示,“北洋来多少,北大收多少。”于是我就转到北大物理系。除了在马神庙理科活动以外,我还常到“红楼”文科旁听。那时旁听不受限制,可以自由出入。有的教室站满了人。不过,我在北大只学习了一年多,得到山东省的留学生补助费,便到美国留学去了。

出乎意外地当了校长

1947年,我在南京,忽见报上登出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的消息。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,因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,既没有人向我通个信息,也没有人来征求过意见。那时只见报载,未见任命,不便有所表示,看事情发展。谁想任命很快正式发表,我就到教育部去询问究竟。原来,1946年春,教育部令准北洋大学复校,聘王宠惠、王正廷、陈立夫、李石曾、凌鸿勋、茅以升等为北洋大学筹备委员,并于五月间任茅以升为校长。8月,因茅以升不能就职遂命教务处金问洙兼代校长。不久,金问洙辞职,教育部聘训导长钟世铭为代理校长。1946年冬,南京教育部虽任命刘仙洲重任校长,但他坚辞不就。堂堂北洋大学的校长一职,竟形成长期代理,全体同学遂派出代表赴京请愿,要求迅速派出正式校长。当时教育部长是朱家骅,他对我说:“学校要人,没办法。”学生代表则向我诉说北洋大学在抗战期间辗转流离的景况,并愤慨地说偌大的国内知名学府,胜利后已快两年了。竟不派正式校长,形成无人治理现象。这时天津亦有电报催促。睹此情景,深觉虽无能力,但有责任,承担下来努力干。我便二话没说,决定“去!”遂到教育部提出要求:一、要保证经费;二、对教授聘任不能干涉;三、对学校日常业务要少干涉。我说:“要我去,得支持我,不然没法干。”当时教育部全部答应了我的要求。

我到天津车站时,全体师生员工都来欢迎,那个热烈的场面,使我非常激动,在车站我对同学们说:“同学们!既然叫我来,不管怎么样,我也要负起责任来,大家一块把学校秩序恢复起来,把学校办好!”

我是个搞工程技术的人,习惯于认真、负责和扎扎实实,办教育我没经验,但我认为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中,应竭力做到稳定秩序,先上课。不久学校便恢复了正常秩序。

抗战爆发后,北洋与南开一样,遭到日寇摧毁,损失惨重,一切设备荡然无存。胜利后直到1946年4月,学校仍为国民党军队占驻。1946年11月,一年级和先修班才开学上课。所以当1947年初我到校时,景物全非,教职员宿舍正在修理,我只身一人来津,就住在教室里,床铺放在讲台上。有的教授和我开玩笑说:“校长的房子真大!”那时工作很忙,不但没回到南京的家中去看看,连进城(到市区里)的机会都很少,真是以校为家。

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

1948年8月某日清晨四时,学校突然遭到军警包围,警察局的大卡车公然停在学校门口,准备逮捕学生。学生都不出校门,教授们议论纷纷。张国藩、刘锡瑛等教授对国民党这种法西斯暴行表示非常愤慨。学校正常学习秩序已遭干扰,不能上课。这样一直相持到下午,大约有七八个学生从市区回校,快到校门口时,被军警抓住。校内同学见此情景,一齐上前,将被抓捕的同学从汽车上抢回来。这一下可不得了啦!警察不答应,一定要学校把人交出来,不然就要进校去搜。当时我想,学校绝不能把人交出去,更不能任凭他们进来搜;如果警察进校搜捕,必然与学生发生冲突,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。眼看一场惨案就要发生。我请来几个教授商量了一下,决定亲自去见警察局长。因为这不仅仅是北洋大学一个学校的问题,弄不好会出大事,当即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李汉元,要求和他当面研究。到了警察局以后,李说学校至少要交出几个人来方可。我问他:“学生犯了什么罪?把他们交出去,我对同学也交不了差。”交涉很久,两个僵持不下,没有结果。我的态度非常明朗坚决。稍息后,李汉元提出解决意见说:“你能保证学生不闹事吗?”我立即回答:“我的学生根本没闹事,能保证。”李说:“保证不闹事,我就可以下令解除包围。”我说:“好!一言为定。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,还须要校委会讨论通过。”遂立即在警察局长室给学校打电话。因情况急迫,立即召集校务会议,我回校后,即行讨论。

在校务会议上,我向大家说明了和李汉元交涉的情况,并说局势很紧张,我作了保证,因为学生根本没闹事,请大家考虑。会场非常沉静。良久,有一人说:“张校长你为什么提出保证呢?”我说:“眼看惨案就要发生,我的学生我当然保证。”从出席校务会议教授们的神色能看出大家是同意这样处理的,但我又等了一会儿,以便大家能充分提出意见,才说:“大家如果同意这样处理,我们请学生代表来谈谈。”校务会议通过后,立



即请学生代表来发表意见。同学们也同意后,我立即在校务会议上打电话给李汉元,告诉他我是在校务会议上打电话给他,大家同意我的保证,请即刻下令解除包围。不到一刻钟,校门外的军警撤退,那时太阳已偏西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有两位教授来找我,说:“有四五十个同学已过铁路,到解放区去了。”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

后来学校的经费越来越困难,我已订好飞机票,要到南京去交涉经费。正在这时,教育部有命令迁校的消息。我认为学校不能迁,也不应迁。为了稳定学校情绪,我暂时不能离校,于是把飞机票退了。后来,由于经费长期没拨,学校实难维持,于是我再次决定到南京去催。不久,交通断绝,没法回来了。

北洋大学和水利人才

有人说:北洋大学出了不少水利人才。我认为,如果这个估计接近事实,它有学校的因素,也有社会的因素。

北洋大学的工科是有基础的,如前所述。从事水利工作的人,大都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,而水利系则是较后成立的。水利系的基础课程和土木系相同,在没成立前,土木系也教授一些水利专业课程。水利系的设立,和当时的社会需要有关,也和我国的历史有关。我国历代对于江河的治理、运河的开凿、农田的灌溉和排涝等事业,都十分重视,并有大量的实

践。到了近代,对于华北水系、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灾害的治理,更提出迫切的要求,并成立了相应的治理机构。尤其在北洋所在地的天津,于鸦片战争以后,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,对于海港和海河的治理,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。我国也建立了顺直水利委员会(后改为华北水利委员会),最初还有外国工程师,从事华北各水系的调查研究,规划治理。这就要有大批的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人员。那么,北洋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就有了出路,他们在实践中逐渐成长。这是在旧社会难有的机会。一般说,那时“毕业即失业”,而这些有实践经验的人,有的又回学校任教或兼课,对于学生的培养,又起着积极的作用。北洋大学在旧社会,相对地说,培养了一批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员。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建立了新中国,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地发展起来了。这些水利人员也就更能施展才能,在实践中不断锻炼提高,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。

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,我国最早培养水利专业人员的,并不是北洋大学,而是张謇在南京倡办的河海工程学校。我国水利界前辈李仪祉从德国留学回来,就在这所学校教书,培养许多人才。以后停办了。不过北洋土木工程系则更早些,后期出的水利人才也更多一些而已。当然,从目前的需要说,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希望能培养出更多又红又专的各方人才,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。(本文写于1980年)





“五四”今犹记 “九一”故地游

孙越崎

六十五年前，我在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二年级读书时，亲自参加了“五四”运动。在我跨入生命的第九十一个春天的时候，又故地重游，于3月3日至6日来到天津，参加了天津民革第五次代表大会，参观了两个与外国合资的企业，特别是观看引滦入津工程展览，使我深受感动！几十万军民齐心奋战，工程质量高、速度快，前所未有的，显示了人民的智慧和时代的光彩。我这九十老人能喝到引滦入津之水，觉得特别甜。喜逢盛世心头暖，吃水常思掘井人。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周茹同志、黄逊非同志和市委统战部长黎钦同志都和我谈到了“五四”运动，嘱我为文，以资纪念。

考进“北洋”

我从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考上了北洋大学法律系预科，读了半年，父亲从哈尔滨来信反对我学法律，嘱咐“学采矿技术很好”。于是，我向赵天麟校长申请。他说：“每年都有招生考试嘛，你考上就可以学，不考可不能转。”我就下功夫复习理化，假日也不休息。我们的宿舍是五六间房大的兵器库改的，界了些矮墙，只容一个铺位、一张小桌和将能走人的小过道，间壁两人共一盏灯。我苦读了好一阵子，居然考入了采矿系预科。我在复旦公学就被选为学生会会长，到了北洋大学又被选为学生会长。当时的教授全是美国人，只有校长、总务长和两名助教是中国人。当时北洋大学所在的西沽与市内隔着很大一片旷野，周围是一片桃林。

“五四”号角

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巴黎和会召开，日本要继承德国在我国辽东半岛的全部特权，北洋政府打算屈辱签约。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大中学生三千多人于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前集会，高呼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、“取消二十一条”、“拒绝和约签字”等口号，举行示威游行，火烧卖国贼曹汝霖住宅，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。军阀政府逮捕学生三十多人，北京学生总罢课，通电全国。“五四”运动的号角在神州大地上回响，号

音飞进了北洋大学那郊外桃园，点燃了我们爱国青年胸中的怒火。5月6日至13日酝酿联络，5月14日成立了天津市学生联合会，5月中下旬组织了示威游行。《北洋大学日刊》发社论，宣传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、“外抗强权，内除国贼”……起到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。

去见曹锐

六月初，9名学联代表秘密集会，到会的有市学联会长谌志笃（河北高等工业学校）、马骏（副会长、南开中学）、沙主培（天津美专），北洋大学由我代表出席。会上决定联合罢课。我回校后重点争取了毕业班的支持，又通知了赵天麟校长，但他不置可否。

6月5日，我们15个大中学校学生近万人，齐集南开中学操场，准备游行。预计经南马路、东马路等市区至河北六经路省长衙门，向省长曹锐（军阀曹锟之弟）请愿。不料，被警察厅长杨以德率北洋保安队所阻。双方相持很久。杨以德宣称可以推选学生代表四人去见曹锐。于是谌志笃、马骏、沙主培和我作为代表，前去谈判。走过海河金钢桥后，桥已吊起。我们进入省长衙门，只见保安队的三支枪、三支枪地架着排过去，真有点土匪窝里那种过“刀门”的味道。转眼间，杨以德不见了，由另一人引路，转来弯去迷宫一般，来到了破席棚里，叫我们坐下。等了好一会儿，教育厅长王章祜假殷勤地跑来说“省长在会见日本总领事和海军舰长。”又过了一阵子，又由一警官来引我们到一个警察训练课堂。警官满脸堆笑，满口同情，只是拖延接见。眼看快到下午六点了，估计可能要扣留我们，我们已准备在这里过夜。这时王章祜出来了，引我们到一个富丽的大客厅里，桌上摆着点心、水果。王章祜、杨以德坐在两边，我们四人也分坐两边，曹锐最后出来，长衫马褂，瓜皮帽，坐在长桌一端。他们想利用饥饿美餐来软化我们，三个人轮番劝吃。我们确实饿了，但是，在这些丑恶而狡猾的官僚面前，我们感到自己人格的力量。我们互相看看，谁也不吃。



面对面斗争

我们要求曹锐打电报到北京要求释放学生，他耍赖地说：“我打一个电报，无非北京政府里多一张纸，没什么用。”他听出谌志笃、马骏和我都是外省口音，听出沙主培是本地人，又见他年轻，就突然把桌子一拍，茶杯破，茶水溢。王、杨奴才般地“省长息怒”连声不迭。曹指沙说：“日本海军一开炮，他们三个一走了事，我们本地人都完了。”我们霍地站起来说：“你这套戏法对你的奴才用得着，对我们可用不上……”正在僵持不下时，有人进来向曹咬耳朵，曹说：“学生游行大队已在门外，要代表出去。”趁势放我们出来了。

我们走出衙门见到大队，大家欢呼并告诉我们：“上海学生罢课！商人罢市了！”于是齐到高等工业学校操场，马骏站在滑梯上汇报。大家高呼口号……

六十五年前那激动人心的情景，至今犹在目前。“五四”精神砥砺我们和后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去迎接四化建设的更加美好的春天。

（本文写于1984年）

